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文集系列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文集

——(第1辑)——

新常态下的 经济增长与发展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林 岗 王一鸣 马晓河 高德步 等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文集
(第1辑)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

林 岗 王一鸣 马晓河 高德步 等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林岗等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 - 7 - 5141 - 8090 - 9

I. ①新… II. ①林… III. ①经济增长 - 研究 - 中国
②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9666 号

责任编辑: 于海汛

责任校对: 杨晓莹

责任印制: 潘泽新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

林 岗 王一鸣 马晓河 高德步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汉德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三河市华玉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34 印张 620000 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8090 - 9 定价: 9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前言

于激流中奋楫，于险峻处登攀。

过去的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供给侧改革的攻坚之年：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将往何处去？全面深化改革将如何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将如何实施？改革开放的成果如何惠及最广大群众？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摆在了学者面前。这些问题中既有“新问题”，也有“老问题”，既有“国计”，也有“民生”，只有认清其关系、理顺其逻辑，才能予以把握，继而展开以经济学为工具的宏观分析。

对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来说，回答这些问题则既是其崇高的使命，也是其优势之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成立于1996年1月，1999年5月重组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联合共建的经济研究机构，并于同年12月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一直以来都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国有企业、资本市场等问题见长。自成立以来，研究院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类学院为依托，为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决策服务，承接了国家和省部级多项重大科研课题，为各行业、各级地方政府及国内外企事业单位提供了大量政策研究及决策咨询服务，始终以知识服务社会。在中国经济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中，研究院发挥着积极的“思想库”作用，并于2009年被新华社《瞭望》周刊评选为43个国内外极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研究水平和科研成果都得到了社会的一致认可。

本书收录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14位学者共计41篇论文，其中大部分都发表于国内一流报纸及期刊。这些论文按照所涉及问题的不同被分为了“新常态下的增长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与反贫困战略”，以及“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战略”等五个部分，其涵盖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诸多方面，并针对特定问题提出了方向性的指引和建

设性的意见。可以说，这些论文不仅仅代表了作者个人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理解，同时也代表着怀有“经世济民”理想的中国学界对于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深刻反思。

最后，还要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及其编辑团队对于本书出版所做的工作。

编者

2017年4月18日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新常态下的增长与发展

/ 1

关于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基本条件的三个问题	3
“十三五”时期如何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	21
高投资发展模式如何转变为适度投资发展模式	26
从两对变量变化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	38
中国经济究竟会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	43
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道路和动力	48
补短板的政治经济学	61
我国经济增长处于下行通道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67
稳增长、调结构需要澄清的五大认识问题	77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限的理论假说及其验证	84
我国水资源能够支撑中高速增长吗	100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增长方式评价	121
劳动力与消费者“分离式”城镇化	144
“债务—通缩”理论的发展与启示	162

第二部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179

使创新成为发展驱动力	18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的关系探析	185

产能过剩与企业多维创新能力	201
当前中国经济新动力形成机制、障碍与突破	223
“高债务—高税负—通缩”三重叠加效应下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及 破解对策	247
中国制造业资源误置及福利损失测度	262
房地产市场结构、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经济增长	281
我国产能过剩的国际视野及政策效应分析	305
中国经济的第三次动力转型	320

第三部分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 343

从“三个赛跑”看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紧迫性	345
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些意见	350
电力市场原理与我国电力市场化之路	365
建立“医保支付价管理”为核心的药价新体制	377
促进竞争 完善监管	389

第四部分 收入分配与反贫困战略 / 393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	395
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合理性的判断标准	400
智慧经济全球化下的劳资关系研究	414
我国农民工福利贫困测度及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426
我国农民工多维物质贫困测度及减贫策略研究	441
消费视角下的贫困测度及精准扶贫探索	458

第五部分 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战略 / 471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稳定之源	473
--------------------	-----

经济全球化前景与中国抉择	478
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490
2016 年国际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493
“十三五”时期国家用好香港地区优势的 路径与选择	498
“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论模型研究	511
“一带一路”战略：跨越历史时空的思考	524

第一部分

新常态下的增长与发展

关于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基本条件的三个问题

林 岗 王裕雄 吴崇宇 杨 巨*

我国经济增长近年来持续放缓，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第二季度起开始下降，2012年第一季度跌破8%，2015年第三季度跌破7%。随之而来的是对我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的各种原因的解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某些影响不小的观点也有与事实不符或以偏概全之嫌，有必要加以澄清。

一、人口增长率下降是否必然会使经济增长率下降

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得益于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但由于近些年来人口增长率，特别是劳动人口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学界出现“人口红利消失”的说法。持此说法者认为，过去二三十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因而经济剩余和储蓄率较高，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经济得以高速增长，而目前我国人口增长率下降和老龄化造成“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使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快速增长失去一个重要的保障。这种貌似合理的说法，在许多报纸和媒体上已经讲了很多年，似乎已经形成关于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原因的一种“共识”。但是，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并不仅靠劳动力投入的不断增加，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依靠劳动效率的提升。从1991年至201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始终高于7%。特别是自2001年代以来的大多数年份，其年增长速度都在8%以上，最高甚至达到了14%（详见图1）。为了明确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数量增加对过去2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我们的计算，1991~2010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劳

* 林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裕雄，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吴崇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巨，湘潭大学商学院讲师。

动生产率的贡献远高于劳动力。特别是自 2006 年以来，劳动力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 4%。这使我们想到尼古拉斯·卡尔多和西蒙·库兹涅兹这两位对经济增长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各自总结出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典型化或特征性的事实中，都将“人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列在首位。卡尔多对这个事实的表述是：“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且并不趋于下降”（Nicholas Kaldor, 1963）。库兹涅兹的说法是“人均产出和人口增长率都高，且人均产出增长率更高”（Simon Kuznets, 1973）。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普遍规律的反映。我国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所起的巨大贡献，是对卡尔多和库兹涅兹所揭示的这个规律的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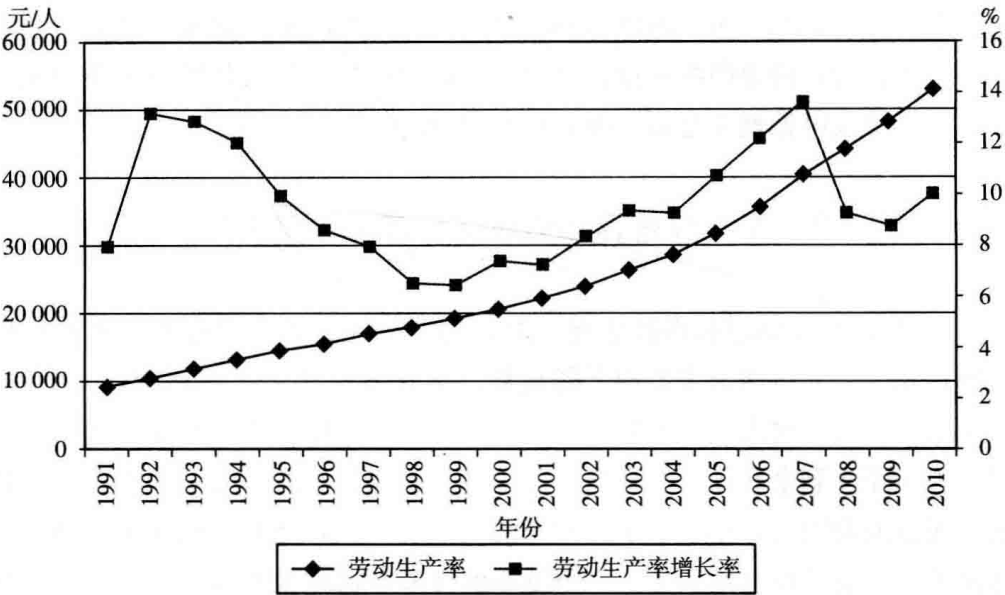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

注：图中劳动生产率数据系以 201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 GDP 除以劳动力数量得到。

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将过去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所谓“人口红利”，如果不说是错误，也是非常片面的看法。事实上，过去二三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固然与人口的快速增长有关，但主要是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大量农业劳动者转移到高人均产值即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的结果。换言之，这种增长的基础和主要动力，都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率保持在十分低下的状态，其产出除了养活劳动者本人而所余非常有限，就不会有足够的储蓄用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投资，劳动人口也就不可能大量转入高

生产率的现代工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为提高总产量而向传统农业领域不断增大劳动力投入，结果只能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的持续下降。与这种下降相伴随的，是经济的缓慢增长以致最终陷入停滞，而不可能是经济的快速持续的增长。可见，所谓的“人口红利”其实是“劳动生产率红利”。

显然，只要劳动生产率仍然保持较高的提升速度，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就能够以较高的速度持续下去（见图2）。假定从2010年到2030年我国GDP翻两番，用2020和2030两年的目标GDP除以当年就业人口，即可得出这两个时间点上的劳动生产率（劳均GDP）。根据翻两番的假定，2020年和2030年的GDP按2010年价格计算将分别达到803 025.6亿元和1 606 051.2亿元，到这两个年份劳动生产率应该达到106 444.2元/人和231 840.1元/人^①，与2010年的52 757.7元/人相比，2020年和2030年需分别提高1.02倍、3.39倍。^②由此可知，如果未来20年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不低于1991~2010年的平均水平，即在8%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会使我国经济增速低于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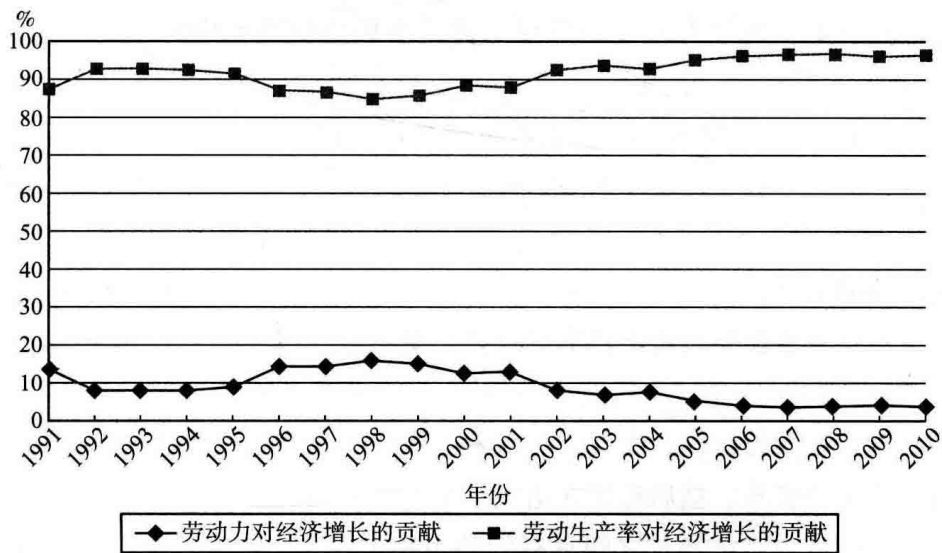


图2 劳动力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资料来源：图中劳动生产率数据系以201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GDP除以劳动力数量得到，劳动力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① 2020年和2030年就业人数并不等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我们假设这两个年份的劳动参与率与2010年一样，这样就可以求出2020年和2030年的就业人数，分别为75 440.94万人和69 274.05万人。
② 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并不完全相等，还涉及劳动参与率，我们在预测时，假设劳动参与率保持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

二、我国的投资率是否应当大幅度降低

近些年，学界和舆论界不少人把我国当前的经济困难归结为投资率过高，一时间要求投资率降低甚至是大幅度降低的呼声很高。那么，我们的投资率是不是应该大幅下降？应当降到多少才算合理？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我们的资金供给情况怎么样，能不能为我们的投资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就国内储蓄而言，根据对构成国内总储蓄的住户（居民）、政府和企业三个部门未来储蓄变化情况的分析和测算，我们估计 2020 年总储蓄率为 47%，较 2010 年的最高值下降 4.8 个百分点，2030 年总储蓄率将进一步下降到 42%（林岗、王裕雄、吴崇宇、杨巨，2015）。不过尽管未来总储蓄率会下降，但仍在世界各国中处于领先地位。不仅比目前美、德、日等老牌发达国家高出约 20 多个百分点，而且比韩国这样的新兴发达国家高出十几个百分点。与阿根廷这样的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则要高出 1 倍。较高的储蓄率，过去是我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今后仍然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重要保证。

当然，长期维持 2008 年后作为反危机举措的高投资率（48% 左右）肯定是不可行的，但是否就应该像一些有影响力的国外和国内研究机构所说的那样，我国的投资率应该在短期内下降到 40% 以下呢？^① 我们的看法是否定的，因为显然没有理由将储蓄率压低到预期的储蓄率之下。应该看到，过高的投资率固然不可取，但低投资率也会导致经济停滞的灾难。世界上经济业绩较差的国家，无论是陷入“贫困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普遍具有低投资率的特征。相反，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经济体，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是以投资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保持持续上升势头，然后稳定在适当水平为特征的。

对于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的动态相关性，“钱纳里模型”（Chenery and Strout, 1966）做了一个经典的刻画：在各国工业化过程中以及与工业化相伴的城市化进程中，投资率都会呈现一个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稳定的“马鞍形”变化轨迹。“钱纳里模型”依据 20 个国家长达 20 年的数据（主要为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数据）得出不同发展阶段的最优投资率（Chenery, Rob-

^① 例如，研究报告《2030 年的中国》认为，我国的投资率 2016～2020 年应下降到 38%，2021～2025 年继续下降到 36%，2026～2030 年进一步下降到 34%（世界银行和国务院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 年版）。

inson and Syrquin, 1986)。我们利用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将时间跨度扩展到 42 年（1960 ~ 2011 年），对 91 个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投资率的实际值进行了测算，绘制出随人均 GDP（按 1964 年美元价计算）变化的“马鞍形曲线”，进一步验证了钱纳里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我们挑出 17 个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发达经济体，寻找出它们的投资率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由上升转为下降的转折点。我们发现尽管各国情况差异较大，但在这 17 个国家中，有 12 个国家的投资率转折发生在高于按 91 个国家平均计算的 2 400 美元的人均 GDP 水平上，其中美国的投资率转折点更是高达 4 940 美元（见表 1）。如果我国从 2010 ~ 2030 年实际 GDP 年均增长 7.2%，顺利实现翻番目标（2030 年 GDP 约为 2010 年的 4 倍），那么，按 1964 年美元不变价计算，2020 年我国人均 GDP 约为 1 242.1 美元，2030 年约为 2 425.3 美元。对照上述发达经济体的经验，2030 年之前，我国投资率到达由升转降转折点的可能性不大。

表 1 典型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投资率变化的转折点

国家	转折点投资率（%）	转折点人均 GDP（1964 年美元价）
澳大利亚	33.01	2 522.44
奥地利	30.47	2 878.71
加拿大	26.39	2 876.98
丹麦	26.31	4 163.40
芬兰	34.39	3 287.89
法国	26.57	3 306.74
德国	30.06	2 133.50
希腊	39.05	1 665.42
冰岛	32.75	3 660.70
以色列	27.87	2 337.50
意大利	26.03	3 065.74
日本	37.89	2 743.35
韩国	38.70	1 623.51
新西兰	26.59	2 984.86
挪威	34.98	4 812.76
新加坡	46.86	2 146.28
美国	20.81	4 940.1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根据前面的分析,按照 2030 年之前我国的人均 GDP 水平,目前我国的投资率变动还处在“马鞍形”曲线的上升段。如果在短期内将投资率强行压到 40% 以下,将导致投资需求严重不足,使我国经济增速大幅下降,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合理的做法是剔除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的时期即 2009 ~ 2013 年(这 4 年投资率在 48% 左右),将之前的 2003 ~ 2007 年正常发展状态下的投资率,看作确定我国未来中长期投资率变动趋势的参照。据此,可以假设,在 42% 这个正常投资率基础上,到 2020 年,投资率再增加一个百分点,达到 43%。如果我国的投资率转折点在按上述 91 个国家计算的 2 400 美元人均 GDP 平均水平上发生,转折点的时间是 2030 年,那么投资率较 2020 年还要增加一个百分点,为 44%。

主张我国投资率应该大幅下降的一个理由是指责我国的投资率过高,浪费严重,投资效率极低。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是需要商榷的。国民经济的宏观投资效率,即固定资本的增加对 GDP 增长的贡献,可以用资本边际生产率(ICOR)来衡量。^① 根据定义,ICOR 越高,单位 GDP 增加量所需固定资本越多,即投资效益越低。在用 ICOR 来衡量宏观投资效率时,应当注意产业结构的影响。施图德蒙德(A. H. Studenmund, 1968)指出,资本密集产业比重较高的国家,ICOR 普遍较高。拉德莱特和萨克斯(Radelet and Sachs, 1998)也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正处在快速资本深化时期或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大量投入的时期,很容易出现 ICOR 指标提高的情况,但这并不表明投资因不经济的利用而效率下降。我们计算了 1980 ~ 2013 年我国的 ICOR 指标,绘出图 3。从该图可以看出,从 1990 年以来,我国的投资效率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都大幅下滑,这显然是反危机强刺激措施的结果。如果剔除与两次危机对应的 ICOR 峰值,在 1990 ~ 1997 年的正常发展时期,ICOR 数值 8 年低于 3,而且多数年份低于 2;在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危机之间的另一个正常发展时期,即 2001 ~ 2008 年,ICOR 数值 9 年都低于 4,其中从投资率跨过 40% 的 2003 年到全球经济危机开始的 2008 年,ICOR 数值 6 年持续低于 3。在这两个正常发展时期,随着投资率的提高,ICOR 数值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并未造成什么严重

① 其定义是: $ICOR = I / \Delta GDP$, 其中, I 为当期固定资本形成额, ΔGDP 是当期 GDP 的增量。固定资产投资利润率也常常被用来衡量投资效率。这是从投资人所获收益的角度得出的指标,并不能全面地反映投资为社会带来的全部收益,因为投资不仅为投资人带来利润,也为在投资所造成的就业岗位上的劳动者带来工资。此外,投资利润还会受到收入分配变化的影响,即由劳资关系变化决定的利润在净收益(增加值)中所占比重变化的影响;在净收益不变的情况下,投资利润率也会由于利润占比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利润率不是衡量投资的宏观效率即投资与全部国民财富的的增长的关系的恰当指标。

不利后果。相反，这两个时期都是以较低通胀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为特征的。这两个正常发展时期，也正是我国的产业结构快速升级、资本密集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推进的时期。这两个时期之间 ICOR 数值的有限上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良性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能用投资因不经济的利用而效率下降来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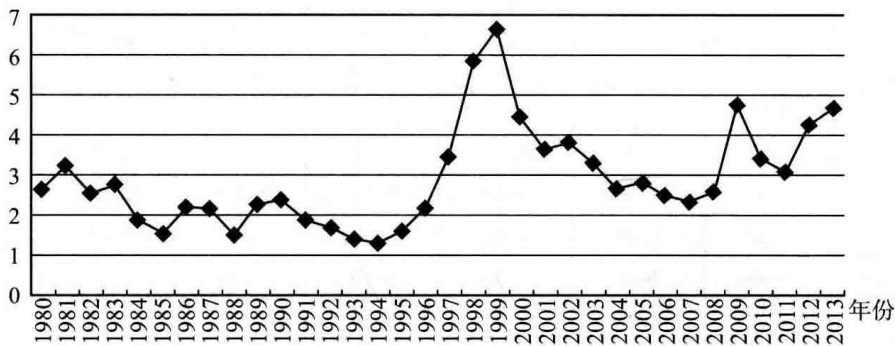


图 3 我国宏观投资效率

如果将我国的 ICOR 指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详见表 2），可以发现，我国宏观投资效率处于较高水平（ICOR 指标较低）。较大的投资规模加上投资的较高效率，是推动我国过去 20 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今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我国某些部门和行业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确实存在去产能的问题。但是，对于目前的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应当有全面的认识。与这些过剩产能相关的过去的投资决策，是根据当时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状况做出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是合理和必要的，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所谓产能过剩，是相对于现在发生的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和国际经济的萧条状态而言的过剩，并不是生来就过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经过一段繁荣之后，总是会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出现，总会发生范围或大或小的“去产能”过程，出现过去投资形成的某些固定资产的“湮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资应当大幅度减少。相反，要尽快实现转型升级（这意味着开辟许多新的投资领域），帮助一些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渡过难关，避免“去产能”导致失业过度增加和资本的不必要的毁灭，遏制经济的持续下滑，投资就必须保持足够的力度。